

LI SHI HUI GU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记录历史瞬间·回忆革命历程

历史
回眸



永远的丰碑

主编：殷立群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K250.6
107
:14

永远的丰碑

主编：殷立群

(十四)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的丰碑/殷立群主编.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5.12

ISBN 7-80702-358-9

I. 永... II. 殷... III. 中国—现代史—史料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5399 号

永远的丰碑

主 编 殷立群

责任编辑 于 泓

出 版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明辉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123

字 数 2133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702-358-9/K·21

定 价 439.00 元(全十八册)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三、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中国革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进一步加强国共两党的合作，巩固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权，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参加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的斗争。这一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正是从这些方面展开的。

建立一支可靠的革命军队，是使革命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孙中山从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 and 以往中国革命斗争失败的教训中，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为了帮助孙中山建立起真正的革命武装，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1924年5月，苏联著名的红军将领巴维尔·安德烈耶维奇·巴甫洛夫动身前往中国，担任孙中山的军事总顾问。巴甫洛夫来华后，很快便为孙中山制订了一个将一些地方军阀部队改编为粤军的计划，并准备进一步将这些军队改造为国民革命军。此外他还向孙中山提出了成立国防委员会，在军队中建立政治机关和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等许多积极





的建议。但是十分遗憾，巴甫洛夫还未来得及将自己的设想全部付诸设施，便在7月18日前往广东东部地区视察时，不幸落水殉职。巴甫洛夫牺牲以后，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又于同年10月派加仑继任孙中山的军事总顾问。加仑是苏联红军中的著名将领，曾担任远东共和国总司令、陆军部长和军委会主席。他来中国以后，在广东国民政府的军事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24年6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在黄埔正式开学。黄埔军校成立以后，孙中山亲自担任军校总理，并特别聘请加仑为军事顾问，鲍罗廷为政治顾问。此后，还有几十名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派出的政治、军事顾问先后在黄埔军校担任教员。他们不仅在军事上言传身教，而且借鉴苏联红军的经验，建议孙中山在军校中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以加强对学员的政治教育。中国共产党也非常重视黄埔军校的工作。为了使军校真正成为革命军人的摇篮，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优秀党员被派往军校任职、任教或学习。1924年11月，刚刚从西欧回国的周恩来便被委任为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不久任主任。叶剑英、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等共产党员也先后参加了黄埔军校的政治军事教育工作。

1925年7月1日，根据加仑的建议，在苏联顾问与中国共产党的共同推动下，国民政府在广





州正式成立，鲍罗廷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高等顾问。随后，国民政府又将所辖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使孙中山生前多次主张的北伐目标接近实现。

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在帮助广东革命政权开展国民革命的同时，还试图在中国北方扶助冯玉祥的西北国民军，建立华北革命基地。冯玉祥原为北洋军阀直系将领。1924年10月，他率部发动北京政变，表现出明显的革命倾向。从而引起了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北京政变以后，冯玉祥处于奉、晋、直系军阀的包围，非常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加紧了对冯玉祥的工作。加拉罕和鲍罗廷等人先后会晤冯玉祥，向他宣传国民革命的目的和意义。1925年5月初，共产国际还先后派出以任德江为首的苏联顾问团和由斯卡洛夫率领的苏联顾问组分别到达国民军第一军、第二军的驻地，帮助冯玉祥开办炮兵、机枪、步兵、骑兵的学校，建立兵工厂，培养军事专业人才和高中级军官。此外，苏联还向国民军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方面的援助，以增强国民军的军事实力。但是，此时的冯玉祥在政治上并没有完全转到国民革命一边，仍然是摇摆不定的。为了争取冯玉祥，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也积极与冯玉祥接触，做了大量艰





苦细致的工作。他们征得了冯玉祥同意以后，在国民军中建立了政治俱乐部，宣讲革命的主张，提高国民军官兵的觉悟。国民党也派汪精卫、孙科和孔祥熙等人相继访问冯玉祥，加强同国民军的联系，并任命徐谦为驻国民军第一军代表。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绥远五原举行国民军誓师大会，宣布成立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并郑重地发表了出师宣言。会后，冯玉祥和于右任还亲自高举红旗带领队伍游行，表示国民军出师北伐的决心。五原誓师，是冯玉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正式参加国民革命的标志。冯玉祥采纳了李大钊提出的“围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为北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次大会再次强调了殖民地国家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要求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组织采取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同时必须保持彻底而绝对的独立性。7月1日，在讨论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时，出席大会的中共代表琴华（即李大钊）作了发言。他在揭露外国帝国主义侵华罪行，介绍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情况之后，特别提出了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明确表示：“我们的策略是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先锋队。”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等20名代表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出席了大会。大会分析了国民党内部的情况，确定了对待国民党的方针：“扩大左派，批评中派之游移态度，反对右派。”大会反复强调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指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中国的工人运动迅猛发展，各地的反帝斗争空前高涨。1925年5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革命群众掀起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反帝爱国运动的蓬勃兴起不仅标志着全国大革命高潮的到来，而且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从而更加引起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关注。

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中共代表蔡和森、李立三，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维经斯基出席了会议。正在苏联考察的国民党代表胡汉民也应邀列席了会议。中国革命第一次列入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讨论的重要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这是共产国际第一次专门就中国问题通过决议。决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明确指出：





“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组成阶级性工会的工人阶级，显示出自己是民主群众运动的领导力量，是争取国家独立和建立人民政权的倡导者和主要战士。”决议还强调，中国共产党应当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组织，要加强工人运动，并且发动农民起来参加革命斗争。决议的这些主张基本上符合中国的实际的，对于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尽管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主要精神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却并未认真贯彻执行。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不幸逝世以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有恃无恐，更加猖狂。国共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愈加激烈。1925年7月，戴季陶出版《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叫嚣要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11月，老右派张继、谢持、林森等在北京西山集会，也提出要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党籍。对于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本应予以坚决的回击，但是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陈独秀却以维护国民党的统一为由，采取了妥协退让政策。结果，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虽然因代表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优势而通过了谴责西山会议的决议，开除了邹鲁、谢持等人的国民党党籍，责令戴季陶反省，但在最后选举时，由于张国焘执行了退让方针，而造

成 36 个中央执委中，共产党仅占 7 人的局面，比原计划少了将近一半。国民党右派却在中央执委和监委中占了绝对优势。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投机革命的蒋介石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实力得到了加强，政治野心迅速膨胀。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力，蒋介石经过精心策划，利用共产国际和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害怕统一战线破裂的心理，选择鲍罗廷离粤回国述职，加仑回国治病和陈独秀因病住院，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去北京开会，不在广州的时机，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事件发生后，当时正在广州的苏联视察团负责人布勃诺夫继续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把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轻描淡写为“一场误会”。而羽翼未丰的蒋介石见目的已达到，也借机放人，下了台阶。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阴谋篡夺领导权的一次重大试探，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领导却未能从中吸取必要的教训，仍然一味退让，更加助长了蒋介石的嚣张气焰。1926 年 5 月 15 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提出了旨在限制共产党活动，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这一提案在会前就已得到了鲍罗廷的同意，会议期间张国焘又要求中共代表签字接受，结果使这一提案顺利获得通过。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分子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和各部部长。国民





党右派的力量又一次得到加强。

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领导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对蒋介石作出让步，目的是想以此来维持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

1926年6月5日，国民党中央通过了出师北伐案，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加仑任军事总顾问。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由于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积极参加了北伐战争，努力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国际和苏联顾问对北伐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援助，加仑等苏联顾问不仅为北伐拟定了作战计划而且亲临战场指挥，所以北伐军进展神速，势如破竹。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就接连攻下了湖南、湖北、福建、江西、浙江、安徽、江苏等省的全部或一部，打垮了吴佩孚和孙传芳，北伐取得了巨大胜利。

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极大关注。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扩大全会，着重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中共代表谭平山和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出席了大会。会议专门成立了中国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报告》。决议与报告科学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指出：中国革命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是把自





己的锋芒指向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民族解放革命。中国共产党应竭尽全力争取最终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革命前途。决议和报告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指出：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建立有战斗力的民族革命战线，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顺利进行反对外国资本统治的斗争。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核心问题是实现对农民的领导，中国共产党要尽快制定土地革命的策略。决议和报告还反复说明了国共合作的重要意义，要求共产党人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应参加广州政府。这些指示应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中国革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决议与报告也有缺陷，主要表现在对国民党的估计仍然过高，幻想依靠国民党来完成土地革命的任务。这些缺陷对中国革命也造成了严重影响。

1926年12月中旬，几乎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举行了特别会议。维经斯基和鲍罗廷都出席了会议。陈独秀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他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民众运动勃起并日益向左转。而蒋介石则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如此发展下去，将会造成联合战线的破裂。因此，为了争取蒋介石由右回左，中国共产党应该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即放弃土地革命，并且要扶助





汪精卫以制约蒋介石。根据他的报告，会议最后作出了决议。

然而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倒行逆施并没有因为陈独秀的妥协投降而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越来越猖狂。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提出要把国民党中央机关和国民政府迁到南昌，企图把南昌作为他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大本营。并且公然叫嚣：“倘使有人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谁要反对我的革命，谁就是反革命！”1927年3月6日，蒋介石指使其亲信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接着在南昌、安庆、南京、杭州、福州、重庆等地相继发生了国民党右派捣毁国民党地方党部及群众团体、屠杀革命群众的事件。

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共产国际及其派驻中国的代表是有所察觉的。1927年3月初，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必须在军队中加强国民党和共产党支部的工作，必须坚持武装工农，必须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揭露和打击右派；必须认清形势，坚决开展群众运动以挽救革命。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共产国际对蒋介石下变革命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仍然幻想利用蒋介石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因此，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等人并没有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贯彻共产国际的三月





指示，从而丧失了挽救中国革命的良机。

1927年4月，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4月6日，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张作霖搜查了苏联驻华使馆，逮捕李大钊等十余名藏在苏联大使馆内的中国共产党员。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叛变革命，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与此同时，在蒋介石控制的广州、南京、无锡、宁波、杭州、厦门、福州等地，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也大批遭到屠杀。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共产国际随即转变了对中国革命的方针。4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措辞强硬的《关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全世界无产者、农民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宣布：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是帝国主义强盗的同伙，是国民党革命派的敌人，是工人运动的敌人，也是共产国际的敌人。但是，在如何应付事变后的局势，继续推进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之间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1927年4月27日至5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党在紧急时期的政策和策略。然而，整个会议期间，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顾问鲍罗廷却一直在争论不休。鲍罗廷与陈独秀主张将革命根据地转移到帝国主义势力薄弱的西北地区去。罗易则指责这是小资产阶级失败主义的表现，强调共产党必须掌握革命领导





权，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但他又提不出切合实际的办法。结果，大会虽然作出了一些决议，却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就中国革命的性质、民族资产阶级政策以及关于武汉政府等问题作了详尽的阐述，既批判了联共党内的托洛茨基主义，也批判了中共党内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最后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会议期间，共产国际还专门给中国共产党发出两个紧急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开展土地革命，改造国民党领导机关；组织工农武装；组织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这些指示的精神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在如何落实的问题上，共产国际的基本指导思想却是试图依靠武汉国民政府，依靠汪精卫来挽救中国大革命。所以，五月指示根本不可能在中国得到真正贯彻。

面对日益复杂的形势，罗易出于对汪精卫的幻想，竟将共产国际五月电报指示交给了汪精卫，想以此换取汪的信任。然而事与愿违。早已被革命浪潮吓倒、准备背叛革命，正苦于没有借口的汪精卫，恰好抓住了把柄，他先是解除了鲍罗廷的职务，接着又在郑州与冯玉祥策划反共。随后，蒋介石、胡汉民和冯玉祥又在徐州举行秘密会议，



决定“清党反共”，“宁汉合作”。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中央常务委员会第20次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分共的主张。随后，在“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下，汪精卫开始了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大屠杀，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遂遭失败。维经斯基、罗易、鲍罗廷、加仑等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派驻中国的代表被迫返回苏联。





四、共产国际 与中共三次左倾错误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建立了反共反人民的新军阀统治，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对内加紧剥削广大工农群众，残酷镇压革命，实行白色恐怖，革命处于低潮。其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转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营垒，反革命的力量暂时超过了革命的力量。1927年4月，中共党员人数已超过5万，而到了这年的11月，人数锐减到1万人左右。革命何去何从，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关头。为了帮助中国革命，帮助中共中央及时转变斗争策略，1927年7月14日，共产国际作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的决议》。决议宣告国共合作的政治局面正式结束，并据此精神向中共中央发来电令，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审查旧政策、旧机关，制定新政策。此前，共产国际已派遣罗明纳兹为共产

